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菲·卡斯特罗

1962年3月26日的电视讲话

編者按：1962年3月27日出版的《今日报》刊登了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3月26日通过全国电台和电视台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播送員：晚安，观众先生們。古巴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今天晚上向人民广播統一革命組織第一书记、革命政府总理卡斯特罗博士答《今日报》記者劳尔·瓦尔德斯·比沃同志、《革命报》記者伊蒂埃耳·莱昂同志、《晚报》記者埃尔內斯托·貝拉同志等新聞記者提問的談話。

卡斯特罗博士打算談談統一革命組織——他是這一組織的第一書記——的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由瓦尔德斯·比沃同志提出的。

新聞記者：卡斯特罗同志，近来我国人民非常热情地听取了您和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领导委员会其他同志的談話，您們在向群众的談話中，坚持必須改善革命的一切工作，以偉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同錯誤和缺点以及向宗派主义和調和主义作斗争，关于这一方

面，我国人民希望您今晚談談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委員會最近做出的关于改善組織机构、純洁和加強积极的革命核心組織以及改进革命工作的方法和形式的決議。

卡斯特罗同志，您在这方面，能和我們談些什么呢？

卡斯特罗博士：好，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問題要談。

首先，我想在这里提出列宁的一个思想。列宁曾經說过，一个革命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說它的严肃性，主要是根据它对自己錯誤的态度来衡量的。同样理由，我們作为革命者和执政者的严肃性也是根据我們对自己錯誤的态度来衡量的。

当然，敌人总是非常注意地来了解这是些什么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不进行自我批評，敌人会利用这些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进行自我批評，敌人也可能加以利用；然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們不能克服錯誤，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能克服錯誤。因此，我們决定对我們自己的錯誤采取誠实和严肃的态度。

在这方面，作为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委員會成員的我們这一批革命同志进行了广泛的討論，对从1月1日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对(革命組織的)整个組合过程做了严肃的、誠实的和深入的分析，对我們所做的一切——所办的好事和所犯的錯誤都做了分析。

因此，我們对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整个时期进行了分析。这不是一个簡單的問題，也不是无关重要的問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因为很簡單，它同革命政权有关系，同革命的方法

有关系，同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关系。

至于革命，它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革命的过程、起源和发生这次胜利的革命的历史时刻，这一革命过程特有的条件，参加革命的各种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观点而斗争的各个派别，总之，这一切正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理所当然，在这个熔炉里——因为革命过程是各种力量的真正熔炉——革命会力图创立、组织和建成自己的革命组织。在革命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革命组织，负责推进革命，不断地发展革命和规划革命的未来，也就是说以长远观点规划革命；否则革命是不可想像的。

理所当然，革命关心组织自己的政治机构和革命机构的问题。我们曾经在这里不止一次阐述过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过这个过程各种革命力量逐渐团结和统一了起来，这些革命力量参加了这个过程，或者是代表着群众力量、思想力量和舆论力量。此外，它们还代表经验和代表必须在这一组织内成为革命骨干的巨大财富。

革命过程的一个产物是，随着同不革命的派别、反动的派别、右派、保守派和亲帝国主义派别的斗争，各种力量和各个革命派别接近和团结了起来，它们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统一。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过程具有自发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事先考虑好的过程，也不是一种计划好的过程，而是一种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由于一种真正的革命斗争所引起的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斗争中，一边是那些不符合真正革命观点、革命思想和革命态度的人，另一边是那些代表革命态度、革命路线和革命思想的人。

现在，尽人皆知，已经延续了三年并包含着各种事件和各种

斗争的这一过程的发展，并不是正规的和平静的，而正如所有的革命一样，在目前古巴革命的条件下，在它独特的条件下，在困难的情况下的一个革命，必然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困难，革命一直在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和克服这些困难。

那末，这个革命力量统一的整个过程，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步骤，全都沒有錯誤嗎？不，并不是全都沒有錯誤。这些錯誤不是可以避免的嗎？不可能精确地说这些錯誤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我內心的想法是，这些錯誤不是可以避免的，換一句話說，是无法避免的。

某些问题、某些缺点、某种态度即使不是不可能避免——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因为，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一个革命中，掺合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千差万别的各种思想、工作方法、观点和各种各样的人，有限制着革命过程的无穷无尽的条件。因为这个过程是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唯心主义地以人們头脑里的想法为基础的，这个过程是以某种经济、社会、政治现实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现实。

因此，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着这一过程。我們沒有能避免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下列情况决定的：一系列的开小差和背叛活动，几乎在革命一开始迈出最初的前进步伐时便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对革命的态度；甚至要反对一系列的野心活动，特别是革命一开始便和統治阶级的利益、和那些害怕革命并把革命看成是一个威胁的经济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和这一阶级的思想意識发生了冲突；同这一阶级的思想、人、态度、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我国灌輸并由进步的敌人加以宣揚的在我国的一系列根深柢固的思

想，同一系列的虛偽思想、保守思想、反革命思想发生了冲突，而这些思想实际上具有习惯的力量，具有多年以来的、在某种情况下具有几十年甚至可以說具有几世紀的力量。

这些思想曾具有迷信的力量，具有一系列因襲下来的謊言所拥有的力量，具有曾作为无可爭議的真理向人民推荐的一系列口号所拥有的力量，一系列經濟、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拥有的力量，几十年来曾通过一切思想宣傳工具，通过书籍、大学、学院以及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党对这些口号和教条进行灌輸。

这就是这一系列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而新的革命思想就是要針對这些思想进行斗争。

那么革命思想所具有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宣傳这些思想嗎？在于为宣傳这些思想而組織起来的党派嗎？在于現有的报纸、电台及电视台嗎？不是。新思想、即革命思想的力量在于我国的經濟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些思想代表真理，这些真理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对抗了被剝削階級的敌人散布的謊言，这些真理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为什么革命的真理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呢？很简单，它們之所以打开了道路，因为这些真理、这些思想符合群众的偉大的理想，符合群众的巨大需要，符合群众的巨大利益。因此，全部謊言被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动派、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全部教条都被粉碎了。他們的全部說教和謊言全被代表被剝削群众的利益的革命思想排山倒海的发展所粉碎了。

但是，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中，群众逐渐轉向革命的思想，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立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轉向革命思想的。某些人采取了对革命思想抗拒的立場，而另一些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場，就是說，贊同革

命的思想的立場。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意見，甚至國內的各個階層，是不能用一把小刀來分割清楚的，因為，這是非常複雜的，甚至必須進行分析，為什麼有人有這樣的反應，有人有那樣的反應。

這一切的根源是在於各個階級的利益。工人、農民、下層居民和貧苦家庭根據他們的利益採取一種態度；而有錢的人、大莊園主、大商人、銀行家和除了反映他們的利益外並受到帝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則有另一種反應。

這種見解或那種見解之間的界綫是錯綜複雜的。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下層人民由於受謊言和迷信的迷惑，採取了違反自己的階級利益的态度；也有人從階級觀點來看雖然不屬於被剝削階級，但採取了有利於革命的态度。有很多青年人，他們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但是，他們有很好的條件，有很好的品質，有偉大的叛逆精神，有偉大的正義和公正的精神，有偉大的對新事物的敏感，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儘管這些因素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這一切事實意味著一場巨大的鬥爭，一場巨大的思想鬥爭。什麼思想戰勝了呢？革命的思想戰勝了，群眾的思想戰勝了，革命的新的真理戰勝了，一切謊言，一切教條，一切虛偽及一切偽善都被擊敗了。

這是說，這場鬥爭已經結束了嗎？沒有，這場鬥爭並沒有結束。這場鬥爭是以各種形式進行的，有時是非常尖銳的形式。也就是說，在新舊思想鬥爭的最初的幾個巨大的戰役中，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已對舊的思想取得了勝利。

但是，鬥爭繼續着，鬥爭仍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它將在全國範圍內、國際範圍內和世界範圍內繼續進行。在我國，在社

会主义、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資本主义之間，在馬克思学說和资产阶級学說、自由主义学說之間展开了一場思想意識的斗争，这场斗争在这里、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論点来进行斗争。

自然，当代表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犯了錯誤时，敌人就会利用这些錯誤。当代表革命真理的人有了缺点和錯誤的时候，敌人就会对这一点加以利用。

例如，我們这些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們，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鎖，因为遭到世界反动派对我们的一切刁难，此外还由于我們的錯誤，在供应上发生了某些問題；例如我們本来完全有条件生产某些商品，而沒有生产，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說：“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經失敗。資本主义不是这样的。在資本主义时代沒有配給，在資本主义时代沒有这一切……”

显然，必須作深入一步的分析，必須說明，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飯吃，而有些人沒有飯吃；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工作，而有些人沒有工作。而社会主义尽管受到各种侵略——我們暫且不管与敌人反对革命、企图把革命扼杀于飢餓之中的阴谋詭計有关的原因——不管这一切，意味着使数十万公民有工作做，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果今天有人抱怨比过去收入少，那末过去几乎沒有收入的那些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有些人抱怨目前收入“这么一点点”，他們这种抱怨就說明了，如果用这点收入来满足他們的需要有一些困难的話，那么过去千千万万人还得不到这么多或是完全得不到一点收入，甘蔗工人过去一年有八个月沒有工作做，沒有鞋穿，也几乎沒有衣穿，吃不上东西，沒有文化，沒有学校念书，沒有医药，什么也沒

有，他們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當然，我們完全能夠反擊敵人的論點，因為，毫無疑問，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有道義和科學觀點的支持，這是敵人的謊言和宣傳所絲毫不能傷害的。但是，無容置辯，敵人利用了我們的錯誤來製造混亂。

自然，在這一過程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有錯誤。一些錯誤產生的根源在哪兒呢？正是現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條件，這些條件引起了鬥爭，同時也導致錯誤。

當時這裡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反對反動思想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反對逃兵的鬥爭和反對保守派的鬥爭是一場殊死鬥爭，因為革命的存在取決於是反動思想還是革命思想取得勝利，取決於帝國主義思想還是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取得勝利。在這場殊死鬥爭里，當一切努力、一切力量和一切注意力都必須放在這一方面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就發生了另一種類型的錯誤，在適當時機，革命也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在適當時機，革命也必須同這些錯誤進行鬥爭。

的確，對於一種錯誤，正如任何消極事物一樣，正如任何有害事物一樣，正如任何疾病一樣，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跡象的，某些人是可以看出正在犯的某種錯誤的。但是，這種錯誤，不到表現得明顯的時候，不到所犯的錯誤已經開始形成一種輿論，也就是說，不到人們認識它——不僅是領導人而且群眾自己也認識到這些錯誤的時候，是不能開始同這些錯誤作鬥爭的。

我們在這裡來談談已犯的錯誤。但是，這是一定類型的錯誤，實際上，只有大家都看清了這些錯誤，當大家都認識到這些錯誤和這些錯誤的消極結果的時候，才能同這些錯誤作鬥爭。

在反對反動思想的鬥爭中，在反對保守思想，反對逃兵，反

对动摇分子，反对消极因素的斗争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宗派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当时展开的这场思想斗争热潮中出现的基本类型的错误。

这类错误是由革命过程发展的条件造成的，是在革命思想必须对保守分子和反动思想展开的严肃的和基本的斗争中发生的。

发生了什么倾向呢？是反面意义的倾向。是不信任一切人的倾向，不相信一切不是老革命党员的人和不是老资格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当然，这样说是正确的：在这一过程的一定情况下，在这一斗争的一定情况下，在展开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在存在混乱的时候，在许多人动摇的时候，如果要任命一个同志担任一个受到重大信任的职务和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而这个职位要求思想可靠的人，要求不会受怀疑和动摇影响的人，那么正确的方法恰恰是，选择一个从思想上和资历上都百分之百可靠的同志，选择一个坚定的同志，一个对革命道路和对一系列的职责在思想上都毫无疑虑的同志。

当有人在这里说“某某代办逃跑了，某某领事逃跑了，某某参赞逃跑了”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说，共和国可以随便委任一些政治上不可靠而又没有很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人，以致他们使革命出丑，使革命丢脸，而造成没有可靠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的景象。

对，这是正确的，这无可否认是正确的。一定的环境会产生一定的需要，但是革命却继续前进。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运动。革命思想逐渐赢得了群众。古巴人民广泛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树立起革命思想。他们的勇猛气势，反抗精神，愤怒抗议暴政统治、专横暴行和反抗不公平现象的义愤填膺的精神，

已經变成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一种坚定的革命觉悟。

具有革命思想觉悟的不是少数人，不是一部分人。革命思想已变成了我国广大群众的觉悟。誰要怀疑这一点，就回想一下哈瓦那宣言，回想一下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和有一百万古巴人参加的大会，这一百万古巴人热情拥护那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包含的革命思想，激进思想，真正先进的思想，他們热烈支持宣言每一句話所含有的宝贵的政治感情。

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群众已經革命化了，证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证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陣营明确了；敌人已被断定为敌人了；所有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貧苦群众，我国那些不富裕的阶层，中間阶层某些重要部分人士，小資产階級各阶层，脑力劳动者，都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事情，都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这并不是什么異想天开的現象，这不是强加在群众身上的东西。正是革命法令和革命事实本身使群众拥护革命，使群众革命化。从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法令开始的一系列事实，一切減輕电话費，取消在暴政統治下訂立的不平等合同的法律，关于城市改革的各項法令，首先是降低房租的房租法，地基法，然后就是城市改革，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和随后的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这一切都是指出革命道路、革命的进展和人民的前进的里程碑和界石。

人民在迅速地进步，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革命化。当侵略危險开始威胁我国的时候，当人們考虑到这里甚至有可能遭到帝国主义强大武力进攻的时候，当人們开始考虑这一危險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很长时期內我們还必须繼續考虑这种危險——

人民动员起来参加了民兵，成千上万的青年变成了高射炮手，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穷苦人当上了反坦克炮手和各种各样的炮手。男男女女成百成千地入伍当兵，加入了战斗部队里，并且准备好，如有必要的话，就展开一场最英勇的战斗，写下我们这样的人民、即任何一个有必要这样做的人民所能写下的一首最伟大的史诗。

这也就是说，我国人民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承担他们的革命态度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毫不迟疑地坚决与帝国主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为了保卫革命和捍卫祖国而全体牺牲生命。有谁能否认群众自动成为祖国的战士的热情呢？又有谁能否认这些群众进行像义务劳动等一系列的工作，响应对他们发出的一切号召，参加要求他们出席的一切集会、一切爱国活动、革命活动而表现的热情呢？

当发生4月17日，或者说4月15日的卑鄙的进攻时，当来自外国基地的飞机攻击我国一些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像以前安葬其他同志，几个月前安葬《勒库布尔》号事件^①的牺牲者，安葬这些受到反动派、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剥削者杀害的牺牲者一样地去安葬那天牺牲的同志的时候，正是在那天，在那个反帝战役的前夕——而不是在这一战役之后——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把实际上的事实在口头上加以宣布。

谁能否认这点呢？在那里组成民兵营的无比热情的工人群众高举步枪准备进行斗争，准备战斗！谁能否认祖国的士兵、民兵、男男女女在斗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呢，谁能否认人民在反对吉隆滩雇佣军的斗争中表现的英雄行为呢，谁能否认人们不顾生命冲向敌人的坦克和机枪，冒轰炸的危险在旷野中前进，在敌机攻击下，不顾敌机及敌人榴霰弹的攻击在自己的队伍中所造

成的伤亡不停地前进的无私的精神呢，誰能否认这一切？只要看一看伤亡的数字就能了解群众是何等英勇、何等慷慨无私地投入战斗的。他們自觉地满腔热情地在那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說明什么呢？說明群众的素质已起了巨大的变化。說明他們已經成为革命者。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誰不明白这点，誰就是近視。誰不明白这点，誰就是瞎子。誰不明白这点，簡直就是一个白痴。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难道在当时我們能采取适合另一种实际情况的方法嗎？我們当时能把一定时期曾由于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在一个时期斗争的需要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政策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挑选同志担任国家各种工作、政府各种工作的方法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不能把这些方法变成一种制度！

无疑，辯证法教导了我們。辯证法教导我們說，在某一时期正确的方法，在不久以后可能是不正确的；辯证法便这样指教了我們。否則便是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便是想在需要和条件已經不同的情况下去执行适应于某个一定时期我們需要的措施。我們把某些方法变成了制度，而实际上陷入了可怕的宗派主义。

什么宗派主义呢？这种宗派主义认为，唯一的革命者，唯一可以信任的同志，唯一可以在一个农場、在一个合作社、在国家机关、在任何地方担任工作的人，必須是一个老的馬克思主义战士。我們落入这种情况是部分不自觉的，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这些宗派主义問題是不自觉地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病毒，是在許多人的脑中隱藏住的一种禍害，是很难与之斗争的。实际上确是很难与之斗争的，特别是不到这种病毒引起某

种疾病时是很难与之斗争的。

有人患流行性感冒，他的这种病十天前便已潜伏下了。但只有当他甚至已不能讲话的时候，才知道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人已潜伏了破伤风——我不知道是十五天还是二十天，医生们应该知道潜伏期是多少天，在体内有了破伤风，但是不到破伤风已经冒头，不到发病的时候是不会为他注射治疗破伤风的任何药针的。

我们常常自问和对自己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在一切地方，在各级机构都到处存在的这种毫不容情的、不知厌倦的、系统的宗派主义精神的根源在哪里呢？造成这种宗派主义精神的原因和根源何在呢？这是因为要费很大劲才能了解，只是在一系列的条件下，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宗派主义精神。

有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党的政策，这似乎有许多人要负责。当然，我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对这一切负有责任，但是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同志和新同志们——在这里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称呼，以便于区别，我们不得不有新老之分，让我们在这项广播中这样来称呼吧，而以后我们将给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名字——我来对这一切加以分析。

这种病毒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心灵，这种病毒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病症。因为，自然，由于以后我们将列举一系列的理由，这种宗派主义，作为一种宗派主义是坏的，但是宗派主义的坏处特别是由于它还为更坏的坏事创造了条件。一种病是坏的，但是如果随之还要引起另一种并发症的话，就更坏。某些身体上的疾病，当这几种同那几种同时并发时，能使机体死亡。而当某些政治方面的病症同另几种病症一起并发时，也会给革命带

来最严重不过的后果。

这里，受到我們錯誤危害的是革命，简单地說，所发生的事是：已开始出现一系列荒謬、愚蠢、錯誤的行为。革命离开了自己的正道，走上了岔路。就好像从哈瓦那到奥連特的中央列車到了圣克拉拉或馬坦薩斯时，由于搬錯了道岔，而轉入了一条岔道一直走向薩帕塔沼澤地(Ciénaga de Zapata)。我們过去正是走上了一条完全离开正路的岔道，一直走向薩帕塔沼澤地。

我們进行了分析，曾經必須在我們这些在全国领导委员会中任职的同志們内部提出这些問題，这些同志是为数不多的。我們公开地分析了这些問題，这一系列的表现，一系列的錯誤，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非正常情况。我們进行了彻底和严肃的分析，进行了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說，我們进行了討論和自我批評。

在分析所有这些問題时，全国领导委员会的全体同志，全体新老同志們所抱的精神是非常有益的。这不是一个新同志的問題，也不是一个老同志的問題。在这次討論中，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偉大的精神，這個問題得到了彻底的分析，从1月1日开始的这个过程得到了彻底的分析，对某些方面的分析还追溯到更前一些时候，以便看看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某些問題的根源。当然，我們一致地得出了結論，同志們，一致地得出了結論！因为这些是新同志和老同志經過討論所一致通过的观点。

当时在組成的是什么呢？当时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种极端的宗派主义精神把我們引向哪里去？那些不正常状态，那些現象把我們引向哪里去呢？我們当时的任务之一就是組織革命的政治机构，統一革命組織，这就是說，組織一个将来要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胚胎組織和骨架。这一切前景、思

想、計劃，都受到人民最熱情的歡迎，因為在所有的大會和集會上，組織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的主張都受到了群眾的歡呼通過和熱情擁護。

當時我們大家都在投身於組織這個政黨的任務。在這裏的每一個人都在這個工作戰綫或在那個戰綫完成着無數的任務。每個人都在做最多的事，準備抵抗帝國主義這個敵人，同帝國主義這個敵人進行鬥爭，在文化方面，在各个方面展開鬥爭。總之，展開了大規模鬥爭，耗盡了人們的熱情……不，不是耗盡了熱情，我們用另外一個詞吧，——因為熱情並沒有被耗盡，也永遠耗不盡——，這些鬥爭吸取了、耗費了領導同志、革命同志的熱情。

另外一些人在為建黨任務而工作。這個政黨正在建立起來，或者說，統一革命組織正在建立起來，統一革命組織正在組成起來。但是，我們確實在建立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嗎？我們在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嗎？我們確實在統一革命力量嗎？我們不是在統一各種革命力量；我們不是在組織一個政黨，而是在製造一具鐐銬；我們不是在組織一個政黨，而是在製造或者生產一件瘋人拘束衣，一副枷鎖，同志們，我們不是促成革命者的自由聯合，而是在形成一支訓練得俯首貼耳的革命者的軍隊。

為什麼？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時候，種種情況的湊合使某些個人得以歪曲一個組織的職能，過份擴展他們自己的職權，濫用工作上的方便，很糟糕地利用這些方便條件。簡單說來，所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些。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呢？我要談談我這方面的情況，我相信這也是許多同志的情況——因為我們既然同革命休戚與

共，既然視革命為我們每個人生活中切身的根本問題，既然視革命為我們的血肉和靈魂；既然熱愛革命甚於一切個人利益、一切虛榮心、一切野心，既然對革命懷有摯情，像任何一個人為他的工作、他的創造心懷深情一樣——像一個藝術家珍重他的作品、他的畫、他的塑像，一位父親或母親疼愛子女一樣——；既然我們都是對革命懷有这样的摯情，我們怎能想到其他人會對它有另一種看法，我們怎能想到，對於我們大家如此神聖，讓我們付出了这样多的熱血，付出了这样多的痛苦，付出了我們人民这样多的犧牲和这样多的精力的革命，會被任何人利用為一種口實、一種工具，來滿足虛榮心、滿足野心、滿足種種並非純淨的革命的動機。

為什麼不信賴一個同志呢？為什麼居然能設想一個同志可能會利用種種於自己有利的條件來實現個人的計劃和目的，使這一壯麗的革命事業，這一全民的壯麗事業；使這一古巴民族的莊嚴史詩，變成一具鐵鎊、一件瘋人拘束衣、一個反革命的胎兒，變成對革命的障礙呢？我們怎能这样設想呢？

這就是在統一革命組織（或者說分散的革命組織）的統一過程中，我們許多人，大部份人，實際上所有革命同志的情況。

得！當我們開始看到問題的時候，已經弄成一團烏七八糟的東西了——請原諒我言語唐突。這要怪那些當事人嗎？不，絕不能怪他們。這些人往往是他人的錯誤的犧牲品。是因為那些當事人絕大多數都不是什麼好人嗎？不，這些當事人絕大多數是頂呱呱的革命者，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忠實於社會主義、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忠實於革命的人。問題並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建立起這個機構時所採取的方法和宗旨。

一個獲得信任的同志——人們不知這種信任是授予的還是

自封的——因为他受到任命或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自发地显露才华而担负了组织工作，亦即担任了统一革命组织的组织书记，他享有大家的信任，并利用革命的威信进行活动；他利用以革命的名义说话、以其他全体革命同志的名义说话的事实赋予一个革命者的权威进行活动，同志们，这个同志已陷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些错误中。这个人就是：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同志。

不得不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得不把它们整个摊开来，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痛心吗？是的，我们痛心。我们不能把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同那些在革命中露头角、后来又背叛革命的人等同看待。

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我们的看法：过去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变成一个反共分子了吗？没有。变成一个资本家了吗？没有。他变成一个亲帝国主义分子了吗？他没有变成一个亲帝国主义分子。他叛变革命投到敌人阵营那里去了吗？他没有背叛革命去投敌。

一段时间以来，埃斯卡兰特是我们革命领导工作中的同志，对那些和他一起工作了不是一年、二年、三年，而是一起渡过了十年、二十年艰苦的斗争岁月的同志来说，这是最沉痛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生是艰辛的，他遭到强烈的迫害、攻击和诽谤，受到围攻，敌人竭力企图孤立他、包围他、摧毁他。今天任何人都看得见，美国是怎样对待共产党人，怎样对待共产党的领袖的，他们使工人共产党员失业，迫害他们，企图饿死他们或像对待亨利·温斯顿一样来对付他们：加以监禁、虐待，最后假慈悲地放出来，这时他眼睛也瞎了，

身体也垮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你们都会看到，反动派是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用仇恨和狂怒。

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经历过这一切并且熬到看见了在我国发生的变化，看到了他在无穷尽的岁月里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在我国变为现实：我们这个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犯了错误；共产党员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共产党员也有过失，共产党员也是人！就只犯一次错误吗？不，共产党员曾多次犯错误。在运动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自从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上和著作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奋斗努力中出现时起，到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时止曾发生过很大的错误。

很多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人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恰恰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成长的。

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同志终究是人，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免不了会犯错误。他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在我们做出的结论中，我们大家都确信，埃斯卡兰特同志在统一革命组织书记任上滥用了对他的信任，奉行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奉行一种背离工人阶级先锋政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政策，并企图建立一个机构作为追求个人目的的工具。

我们认为，宗派主义能够成为一种制度，宗派主义能够成为一种病毒，成为一种真正的疾病，与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同志有很大关系。

埃斯卡兰特同志要对下列事实负责：这种宗派精神被发展

到最大限度，这种宗派精神被利用来达到个人目的，以便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組織，并在这个組織实行一系列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不像我們所說的那样的党，而是建立一种枷鎖，一种镣铐。

我們认为，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同志进行这种活动并不是一种不自觉的錯誤行为，而是自觉的、蓄意的。他单纯地放任自己追求个人野心，因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总之，造成了国内真正的混乱。

为什么？很简单：我們的思想得到人民全力支持，組織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的思想，組織一个先鋒队，一个工人阶级先鋒党的思想得到群众的深刻同情，馬克思主义得到群众的绝对支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古巴人民的思想。

人民完全同意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鋒政党的作用。人民同意由这个党掌握领导和担負革命领导的原则。人民同意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全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使这个全民拥护的机构变成一个追求个人目的的工具。統一革命組織的威信是很高的。統一革命組織发布的任何指示和訓令受到一切人的尊重。但是統一革命組織当时并不是真正的統一革命組織。

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同志想方設法以自己个人来代替統一革命組織，他怎样做的呢？他使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手段：从組織的書記处向所有革命支部和整个組織发布指示，把这当做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指示。并造成一种慣例：到統一革命組織書記处的办公室去听取指示，这些指示被当作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指示受到人人尊重。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局势，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控制权。

但是，既然現在在执行这种政策时实行了发展到极端的宗

派主义，来为这种打算創造有利的条件；既然他担负逐个地組織所有革命核心的任务，既然适合这种政策的并不是一項紀律严格的政策，不是一項有监督的政策，不是一項对这个組織的党员提出严格要求的政策，而是一項纵容的政策；既然适合这种政策的并不是一項适应工人阶级先鋒党所应有的作用的切实的政策，而是特权政策，因此他在創造种种条件并发布指令，使得这个組織不是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鋒組織，而是变成一个特权、纵容和恩賜的窠穴，变成一种恩寵和各种恩賜的制度。这完全破坏了这个組織的作用。

就是說，必須确立支部高高在上的地位，必須破坏这些思想；即馬克思主义政党起指导作用，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鋒政党只能通过一定的途徑，并根据全国领导委员会发布的指令来领导国家的思想。埃斯卡兰特企图树立对各級的領導。就是說，不只是对各級的領導，而且是这个政治組織干預各級行政工作；正是由于这种駭人的、令人痛心的和耻辱的混乱产生了这样一种准則：支部发号施令，支部可以任免行政人員，支部管理政府事务。

因此，正在国内造成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一种真正的混乱。

自然，这同工人阶级先鋒政党、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同志——他曾欺騙那些政府官員，使他們相信他是根据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企图树立的而且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树立的习惯，一个部长已經不能迈过組織書記办公室这一关，不向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請示就不能調动官員或是一个行政领导人。

各級支部发号施令，各部的問題不能由各个部自己解决，而要提到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去。甚至一只猫生四个小猫的問題，也必須提到統一革命組織办公室去研究如何解决。

就是說，沒有任何一桩事、一个問題、一件具体的事务不是在統一革命組織的組織書記办公室中討論的。許多部长經常到那里去討論。副部长們不是把他主管的事同部长商量，而是到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去。保安人員不去保安部門，而常常去統一革命組織的办公室。这样一来，無論是上級还是下級——不要认为这是几个星期的事或几个月的事——已經造成了一种真正反常的、荒唐可笑的、无法容忍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一种个人专断和一种个人决定一切問題的欲望。

在那里，是怎样的支部呢？一个革命者的支部嗎？这个支部正在逐漸变成革命者的小天下，可以任意广施恩澤，任免官員和行政領導人，因为它将不再有一个革命支部所应有的威信，这种威信的获得，只能是因为它在群众中德高望重，只能是因为它的成員都是模范的劳动者，典范的革命者，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給人恩寵和賞賜，可以作威作福的支部。在这样的支部周圍当然就形成了一种条件，造成一批与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阿諛奉承者。

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混乱。这些不是一个革命支部的职能。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搞得一团糟，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搞得一塌糊塗。这首先只是有利于制造混乱和灾难，造成一种畸形状态。一个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掌握革命的領導，掌握国家的領導，但是要通过它的适当的途徑来实现对国家的領導，通过这个机构的全国領導委员会来实现对国家的領導，由它管轄政治机构和公共管理机关。

党具有怎样的职能呢？指导。在各級工作中給予指导，而不是在各級工作中发号施令；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同群众打成一片，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号召群众投身于工作，发挥干劲，保卫革命；宣传革命思想，监察，监督，警惕，报告，讨论必须讨论的问题；然而，没有任免行政领导人、任免工作人员的权力。

当然，既然革命支部集中了最优秀的工人，最优秀的劳动者，那么当一个行政领导人要想任命一个人事科长或随便一个工作人员时，挑选起来，会自然而然到革命支部中去选拔，因为支部的确是最能克尽职守、最优秀、最革命的人们萃薈之处。……然而，这却是要由行政领导人挑选的，而不是由支部挑选的。支部不应该选拔官员。在统一行动党、统一革命党，在一个旧式的自由党、保守党、一个政客政党中可以这样办，而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政党中是不可以这样的。这不过是我国旧日的政客恶习的重新滋长。这不是支部的职能。

支部的成员必须都是最优秀的革命者，最优秀的劳动者。不应该削弱党来加强公共管理机关。公共管理机关应该提拔自己的工作人。国营农场、合作社等机构不应该向支部伸手要人，不应该调入工作人员。应当在劳动者中提拔。

可以相信，在劳动群众中，每五百人之中就至少有五人能胜任将军，有十个音乐家，二十个艺术家。劳动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才能、精力和胆识。

有哪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敢否认群众中蕴藏着胆识、精力和智慧？敢认为智慧只存在于革命支部中，提拔优秀人物只能是从革命支部中提拔？不，支部必须对全体群众进行工作，教育全体群众；然而，当必须任命一个人事科长，一个重要职

位时，不应该眼睛只看到支部，只在它当中挑选，应当从群众中挑出这样一个人，从群众中提拔。

这是行政领导人的任务，这是公共管理机关的任务。公共管理机关应当从群众中提拔，劳动机关应当从劳动群众中提拔，应该选拔自己的工作人员，按工作能力和才干来选拔，否则就会变成一种政客活动，弄成一种恩赐；就会使得支部中笼罩着一种逢迎拍马、无耻钻营的风气。这不是支部的任务！

支部的任务是另一种，是同公共管理机关的任务不同的。党实行领导，通过全党实行领导，通过公共管理机关实行领导。

今天，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有职有权，一个部长必须有职有权；一个行政领导人必须有职有权，必须同技术顾问委员会讨论一切必要的问题，同工人群众讨论，同支部讨论，然而要由行政领导人决定，这是他的责任。

党通过它的全国领导委员会，要求行政官员负起责任来，然而为了要求他们负起责任，还必须给他们权力，必须有权力。假如他无权决定，假如操决定权的是支部，假如在省一级、工地、农场一级、地方一级，都是由支部决定问题，那么能要求部长负什么责任呢？不能要求他负起责任。因为他没有任何职权。

部长有权任命，有权在革命给予他的职能范围内、在国家法律条例给予他的职能范围内任免人员；然而同时也负有责任；他为他的职能、他的工作对革命的政治领导机构负责。简而言之，他要为他所做的工作负责；为了负起责任，就需要有职权。

在这方面，由于这种混乱，由于这种不正常局面，由于这种畸形状态，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部长、任何一个官员、任何一个行政领导人有职权，他们得同支部讨论。这里，我举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同志今天告诉我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看到有必要更換——关于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已經討論過，但是不一定要討論——一個聯合企業、一個肉類聯合企業的負責人，因為認為他不配擔負這一職務，因為他這個人倒有能力領導一家小企業，却不能擔負領導一個肉類聯合企業這樣的重任。怎麼樣呢？主管人召見他，通知他要派他去擔任另一個適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這位同志怎麼樣呢？他跑到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的支部去申訴說對待他是不公平的，他一定要同卡洛斯·羅德里格斯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這裡真是井井有條啊！說真的，我們已經讓這類事情給煩透了！多大的混亂！這是把支部同裙帶集團混為一談了，這是把支部同特權者和施主大老爺的集團混為一談了。這種思想已經滲入統一革命組織中。

沒有一個部長能決定任何問題，要是沒有經過支部的討論，他就必須打電話給統一革命組織的辦公室。試想居然會有這樣可笑的事情嗎？居然會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嗎？同志們，試想居然能有這樣荒唐的事情嗎？

必須如實地說明這種事情。這不是說仇視誰，也不是說輕視誰。我們應該嚴肅地分析、檢查、批評所有這些事情。

很自然，敵人利用這些錯誤來製造混亂，說什麼共產黨人已經控制了一切，說什麼菲德爾已經被布拉斯或阿尼瓦耳或某某人代替，勞爾被另一個人代替，所有人都被另一些人代替。

同志們，敵人利用我們自己的錯誤，敵人利用我們自己的愚蠢。你們想知道所有這些錯誤的原因嗎？想知道某個同志癡迷心窍的領導狂、“領導欲”、“統治欲”，加上一種被發展的并已經達到非常不正常的極端程度的宗派主義的原因嗎？

這是一種實際權力嗎？不，不是一種實際權力，是一種形式上的權力，是一種虛權。在這位同志手裡沒有任何實權，幸亏沒

有任何实权！实权不在那里，同志们，革命的实权是不能这样轻易窃夺的，是不能这样骗取的。这是一种不自量的可笑的欺骗企图。

但是，很简单，在此背后隐藏着一个明显的企图。显然，这样一种弊病在我国是不可能滋长发展的，因为我国不爱好这种温顺，不爱好这种驯服，革命者也不爱好这样！无数的革命同志不喜欢这样，然而有人企图用欺骗的手法来创造条件，使得能够建立一种镣铐，一件拘束衣，一个机构，来为个人目的服务，然后清除革命的一切新的旧的价值。

同志们，难道这是个掌权的问题吗？是一个谁掌权和谁不掌权的问题吗？不是的，同志们，如果这是个掌权的问题，是个谁掌权和谁不掌权的问题的话，我们全国领导委员会的同志们、部长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讲话了。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掌权和管理的方式问题是那么微不足道，因此不值得花时间来挖苦单单一个人，不值得花时间来挖苦一个人，一家人，一位同志。问题出在掌权和统治的虚荣心上，如果人们，如果人人都对世界和宇宙的万事万物、对历史有一点哲学感，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同志们，如果这仅仅是一个谁掌权、或者谁管理、或者谁指导的问题，如果这里讨论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革命原则的基本问题，不是一个涉及革命的实质和革命的存亡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聚会，同志们，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讲话了，我们会干别的事情了。因为，实际上，这些事情——政府本身，权力本身——这些事情是我们不感兴趣的。

此外，我们不是自己要求当政府领导人的，我们也不是在一场摸彩游戏中取得权力的。这是一系列历史环境、一系列事实

經過的結果；這是革命發展過程的結果；某些人適合一種工作，另一些人適合另一種工作，也許我們適合最艱苦的一種工作，因為這些事情，這些義務包含着最艱苦的时刻，像目前、像我們經歷過的其他許多时刻一樣艱難的时刻。

如果在这里討論的問題是權力的問題，是誰管理和誰掌權的問題，那麼我們倒大可以享受我們的權利；退休不干，放棄所有這些職務，對一切事情撒手不管。

同志們，如果不是討論我國的基本問題、革命的基本問題、事關我國前途的基本問題的話，如果不是因為不談這些事情就意味着革命走向深淵，走向莫測的深淵，走向自身的毀滅的話，那麼就不會提出這些事情了，就不會討論這些事情了，就不會向人民匯報這些情況了。

誰管理並不重要，管他是誰，管他叫什麼名字；誰領導並不重要，管他是誰，管他叫什麼名字。重要的問題是要管理好，重要的問題是要領導好，重要的問題是要把革命導向正確的目標。

這個問題之所以需要討論是因為這是革命的切身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需要討論完全是因為這些錯誤必須糾正；這種強加於光輝壯麗的革命進程的政策必須清算，必須連根拔除，必須徹底消滅會產生類似事件的條件，並且創造必需的條件使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先鋒政黨能夠組織成功並發揮作用。

很明顯，這種情況造成嚴重的宗派主義乃是理所當然的，它說明了宗派主義為什麼得到發展，它說明這種難以容忍的，貪婪和無止境的宗派主義，這種出現在一切地方、出現在全國一切角落——從國家的這一端到另一端，從邁西角 (Punta de Maisí) 到聖安東尼奧角 (Cabo San Antonio) ——的宗派主義為什

么……引起一系列的問題和一連串的事實。因為這種宗派主義不能促進真正的統一，同志們！它在統一的过程中促成了與統一格格不入的小團體，它使那些必須統一和溶合的力量仍然作為松散的、無組織的力量活動。在各派力量正式合併統一已有好幾個月的今天，您還可以碰到這種現象：有人站出來說：“不行，因為這不是黨的指示”，是哪一個黨呢？難道不是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組織嗎？“不行，因為這是黨的指示……是黨的指示……是黨的指示……”，這就開始造成真正的混亂。

自然，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系列矛盾，其他一系列麻煩、無窮無盡的問題，無休無止的爭辯和許許多多的壞事。我們也曾經有一次在這裡指出了這一點，我們曾經嚴厲地批評了任何類型的宗派主義，“馬埃斯特拉山”的宗派主義，或者“擺二十年老資格”的宗派主義。

去年12月2日或3日，我曾經談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是這樣說的：我們多么迫切需要反對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既反對那些炫耀入黨多年的人，也反對那些夸耀“我在馬埃斯特拉山呆過”的人：我們堅定不移地批評過一切馬埃斯特拉山的宗派主義，我們嚴厲批評過這種思想，我們是堅定不移的，我們沒有寬容這種宗派主義，我們給了它嚴厲的批評。

我們一貫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我們經常對人民說：過去沒有機會參加鬥爭的人，用不着沮喪，將來機會多的是，整個歷史有待我們創造，革命只不過剛剛開始，我們前面還要走漫長的道路。

有些人以自己參加馬埃斯特拉山鬥爭的歷史向別人大擺宗派主義的架子，對這種荒謬可笑的思想，無論是在山里還是這裡，我們向來是不斷加以批評的。可是，出現了另一種宗派主

义；摆十五年老资格的宗派主义，摆二十年老资格的宗派主义，它沒有及时地受到打击，沒有遭到应得的打击，同志們。

人們忘記了我国共产党员为数不多这个实际情况，因为，正如我們曾經不只一次指出过的，敌人不断地誹謗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給我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造成非常困难的条件，对它加以迫害、包圍、封鎖和孤立。当全体人民成为革命者，当全体人民即我国絕大多数人信奉馬克思列宁主义时，陷入摆老资格的宗派主义，向別人吹嘘自己有多少年的历史，在工作地点自夸自叹，那是多么荒謬可笑啊！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宗派主义不仅是口头上的宗派主义，而且还意味着，为了获得一个人事领导工作，为了能担任企业中的重要职务，担任报酬最丰厚的工作，一定得参加那个宗派。这里要說明，我并不是把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称为宗派，而是把他們造成的或在实行統一之后产生的精神称为宗派。

广大的工人群众，广大的劳动者可以抱什么希望呢？数百万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因为假如說共产党员、老共产党员只不过为数好几千人的話，信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是数以百万計的。

用不着什么聪明人也能了解，执行这种政策，炫耀这种资格，加以实际情况是凡是沒有这种资历的人都絕沒有希望能被选拔担負任何工作，既不能当技术人員，也不能在农場、在合作社、在省市政府、在协调执行委员会或在中央政府中担負任何职务……那么，就可以清楚了解，这种政策是多么愚蠢无知，多么有害，多么蠢笨透頂了。

这种情况的根源何在呢？一种虛荣心，一种握取大权的欲望，一种特权思想。如果不是这些开始在群众中造成对老共产

黨員的反感和懷疑的情況，如果不是這些開始甚至於使一個老共產黨員迷失他的道路、迷失他的方向、脫離他的生活、脫離他的工作、失掉他的精神的情況；還有什麼別的根源呢？

此外還應該注意到對錯誤的寬容，還應該注意這樣的事實：老共產黨員犯了錯誤時，既不對他採取任何措施，也不撤掉他的職務，也不對他給予任何紀律處分，而是容忍所有的錯誤，不論是什麼錯誤，容忍任何濫用權力的行為，容忍任何不公正的行為。

當然，這不是一種群眾的政策，也不是普遍化的政策，而的確是一種容忍一切錯誤的既定方法；製造一種等級的風氣，製造一種小集團的風氣，因為這一切非常適宜於建立一個服務於個人目的和個人野心的機構的政策。顯然不僅造成了宗派特權，而且造成了對一切錯誤的容忍；在許多情況下任命無力勝任的同志去擔任一系列職務；當然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這樣的，我們要公正地對待這些事情。

後果是這樣。自然產生一種握大權的風氣，而某些同志“不擇手段來達到目的”；他們認為，革命是從摸彩遊戲中摸到的；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忘記了革命所流的血、革命所作的犧牲。

我要舉幾個例子。我要舉一個奧連特省的例子，一位先生，他是書記，以前是巴雅摩（Bayamo）區委員會的書記，後來只是被任命為考托市（El Cauto）一批農場的統一革命組織的書記，這位先生叫菲德爾·龐帕——想來他還在那里當書記——他靠妙法被任命擔任這個職位，靠宗派主義的手法，靠個人迷信、真正個人迷信的手法，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錯誤辦法。

當公布全國領導委員會委員的名單時，這位具有納粹“黨

魁”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生——有一些先生們逐漸养成了納粹党魁的习气而不是馬克思主义战士的作風——当着被任命为該行政区領導人的两位同志和一位同他們一起工作的西班牙技術人員的面随便議論，說什么：“这个下流的胖子是何許人？”說是的阿拉貢內斯 (Aragónés) 同志。当他看名单时，他說了另一句話，但为了尊重大家，我不想复述了。他說：“这个吉列尔莫·加西亚 (Guillermo García) 是何許人？这小子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个塞尔希奥·德尔巴列 (Sergiso del Valle) 是何許人？这个艾德·圣塔馬里亚 (Haydée Santamaria) 是干什么的？”这个家伙的言論就是如此。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物？他为什么不知道艾德·圣塔馬里亚呢？为什么不知道吉列尔莫·加西亚呢？为什么不知道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呢？为什么誰也不認識呢？很简单，因为当这些人在这里战斗的时候，他还躲在床底下。

他怎能知道吉列尔莫·加西亚是参加革命部队的第一个农民，是在历时二十五个月的战争中一仗又一仗打出来的呢？是当年投效而沒有在战斗中牺牲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是个身經百战的、謙虛的、对革命有卓越功績的同志。他怎能知道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医生是誰呢？怎能知道他在經過战斗以后在暴政軍隊的包圍下不带卫兵同伤员耽在一起，护理病人，拯救生命，后来加入了战斗部队，同卡米略·西恩富戈斯^②一起担任光荣进軍的副司令，博得了威望和所有人的尊敬呢？如果他躲在床底下，他怎么会知道塞尔希奥·德尔巴列是誰呢？是的，我用了一句話，我翻来复去說这句話，仅仅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應該說的話。

他怎么会知道艾德·圣塔馬里亚是誰呢？这位同志眼看她

的哥哥牺牲，人家把她挚爱的哥哥的眼睛挖出来给她看，她是个坚定的同志，忠实的同志，她安然渡过了整个艰苦和残酷的斗争，这个英勇的同志的名字在斗争的年代中屡次出现。这位先生怎么会知道这些名字呢？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他可能还躲在床底下。

这位先生当年在离马埃斯特腊山只有一天路程的考托河(Rio Cauto)一带闯荡，干些偷偷摸摸、顺手牵羊的勾当；当考莱(Cowley)在屠杀工人和农民的时候；当考莱在一夜之间卑劣和残忍地杀害洛伊纳斯·埃切瓦里亚(Loynaz Echevarría)和其他那么多革命战士时，当工人、农民和学生成千上万地被杀害，而不得不走一天的路程去加入革命部队的队伍时，他搞一个背包到手是毫不费事的。

这位先生有什么权利像一个纳粹“党魁”那样信口议论这些历史性的名字呢？这还不够，他末了还说：“瞧着吧，我们将清除所有这些人，我们将清除他们。”这是什么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这样说话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有这种可笑、自负、不道德、绝顶荒谬的思想吗？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能是这样没良心吗？别人英勇卖命，他却苟且偷生，这样的人应该怎样才是本份呢？起码应该敬重他人，谦虚点，少来点优越感。

像菲德尔·庞帕这样的先生们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人还不少，我们必须组织内把这种人揪出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人清除出去，是的，一定要把这种人清除出去，把他们清除出去！

我永远也不会不公正地把正直的共产党员同这类人相提并论。我十分清楚了解共产党员是怎么一回事，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怎么一回事；我十分清楚了解共产党员曾如何在一切地方进

行斗争；我十分清楚地了解在漫长的斗争道路上从无产阶级战士中涌现了千千万万的英雄和烈士；我的脑海中鲜明地浮现着对斯大林格勒，对一千八百万牺牲的苏联人民；对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记忆；对国际共产党人，就是说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在12月被考莱的匪兵杀害的共产党人——赫苏斯·梅嫩德斯(Jesús Menéndez)、梅利亚(Mella)、比列纳(Villena)、何塞·马里亚·佩雷斯(José Maria Pérez)和其他许许多多被害者，为无产阶级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记忆，因此我连想也没有想到把真正的共产党人同这类人相提并论。

然而，为什么这类人能够获取职务？为什么会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组织的书记呢？这是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环境，由于这种宗派主义政策，由于这种错误的讲私人情面的政策，由于这种错误的政策，偏差的政策。

由于这些面素就能建立一个机构，这种情况，加上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利用革命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利用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权威，就造成这类人可以得到优厚的职务的条件。因之，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党，里面会是一些俯首贴耳、无条件服从、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人们。这不是唯一的事例，这类事例还多的是。

另一个事例：在我3月13日的讲话之后，有人在一个大使馆的宴会上说：“菲德尔是对……讲话的”，“菲德尔说的话对于追随他的那部分群众是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部分群众吗？还有不追随真理，不遵循革命路线的另一部分群众吗？这位先生名叫巴雷拉(Verela)——我们要点出这些人的名字，让全民都知道这些犯错误的人。他是一个外交部的官员，而且据说他有

点嗜好，老爱“喝得醉醺醺的”。

但是，这类人物倒是气焰嚣张得很。“菲得尔对追随他的那部分群众讲话”。归根到抵，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的说话是否得到群众追随，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那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样想的先生们忘记了遵循革命路线的广大群众，忘记了像一股激流冲垮了暴政，冲垮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统治的广大群众；群众并没有被出卖，他们赋予我们极大的职责、极大的权力，我们没有滥用这些权力，我们只是让大家分担这些权力，我们尽力想用这些权力为祖国谋福利，而丝毫没有用于追求任何个人目的，因为归根到抵我们个人在这场斗争中又何所求呢？

我们，我们，我们大伙全都幸运地看到这种梦想、这种幻想、这种愿望变成了现实。我们比马蒂^③、马塞奥^④、马克西莫·戈麦斯^⑤、吉特拉斯（Guiteras）、梅利亚、塞斯佩德斯^⑥、阿格拉蒙特^⑦，比我们所有先驱者都要幸福，能够看到我们的旗帜作为一面完全自由、独立、主权的旗帜在空中飘扬，能够看到祖国的名字传遍世界，享有莫大的威信，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东西要追求呢？

我们并不是对追随我们的那一部分群众讲话，我们是对革命群众讲话，我们是本着一个革命领袖所应有的风格，忠诚老实地、没有个人好恶地对群众讲话的。

这一类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有些人犯了宗派主义，只不过读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或者过去读过但是并没有领会，却居然议论起来，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⑧是一份反动文件。

够了！这种先生怎么懂得哲学和革命！首先，我们并没有

宣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沒有，先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不过是先进思想、发展中的革命思想的表白，它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然而是一个追求馬克思主义并且开始像馬克思主义者一样行动的青年的思想。

但是，这个文件不在于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理論价值，它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活生生地譴責了暴政的一切恐怖和罪行，把这个如此殘暴、卑怯、暴虐和凶杀的政权揭露无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有一点小小的功績的話，首先在于它在刺刀丛中，在两手染滿我們八十個同志鮮血的士兵簇拥中发出了这种譴責。在那种环境中大声疾呼。今天任何人都能站到讲台上发表长篇演說而平安无事，沒有麻煩，也沒有警察，沒有枪杀，也沒有死亡。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样說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任何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时，譴責这些事情比今天成为革命者还要难些。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用不着在革命教育学校中傳誦。它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而是一种发展中的思想、一系列已經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思想的表示，一部活生生的控訴书，而当时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險才能发出这种控訴的。

依照这种邏輯，也有人会說《蒙泰克里斯蒂宣言》(Manifesto de Montecristi)是一部反动文献；1779年^⑨的《人权宣言》是一部反动宣言。这样思考的人的脑袋里究竟塞进了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锯屑？有人說，攻打蒙卡达^⑩是一个錯誤，《格拉馬》号^⑪登陆是一个錯誤。好吧，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事情我們并不感兴趣。我們之所以在这里談到这件事，只是为了分析問題，因为对于那些胡說八道的人，必須一下子堵死他

們的嘴巴，使一切胡說八道徹底絕迹。我們，也只有我們，在這場關於軍事問題的鬥爭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之後，學會了一切之後，我們才有權利決定和討論：如果今天再處於當時的情況下，以我們現在所懂得的一切，是否還會重復蒙卡達事件；《格拉馬》號登陸是採取這種方式還是另一種方式。顯然，我們今天的經驗比當時豐富得多！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以當時的經驗，我們可能還會那樣做的；在今天的情況下，以今天豐富了的經驗……（誰也不能否認人們恰好是按照他們所知道的、按照條件行事的），在今天，可以冷靜地探討其它更好的戰略戰術：攻打另一個兵營，而不是蒙卡達兵營；泅水過來，而不是乘船或乘飛機來，或者紛紛地滲透進來，或者變成一個蛙人在沿岸登陸，總之，諸如此類的事。但是，圍繞蒙卡達和《格拉馬》號事件所討論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路綫，這是正確的路綫，革命的路綫，武裝鬥爭的路綫，不是政客路綫，選舉路綫，而是對巴蒂斯塔暴政進行武裝鬥爭的路綫，是歷史已經證明為正確的路綫。難道能這樣充耳不聞、熟視無睹、目光短淺和愚昧無知，以致絲毫不顧歷史的經驗教訓，不從歷史中吸取應該記取的教訓嗎？

提起這件事，我尚可舉幾個例子：有些人進行討論，往往討論一些蠢事。他們興高彩烈地討論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討論他們所不懂得的东西，討論歷史，討論每一個組織和每件東西的作用。為了什麼呢？終有一天，歷史會客觀地寫出來。歷史是可以創造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這一點我們早就說過，我們相信歷史，相信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創造歷史的正是群眾。是的，歷史是可以創造的，但是不可能臆造！歷史可以發生，但是不能重演！歷史只有一個，不能憑主觀加以篡改，一切經過主觀篡改的歷史都應該重新毀掉，以便為客觀的歷史，

真正的历史开辟道路。

革命乃是由我們的先輩在 1868 年开始进行、直至今天才得以完成的长期斗争过程的产物，革命还将继续前进；它有各个不同的阶段，多种多样的斗争。现阶段的历史是从 1953 年 7 月 26 日开始的，正像 1868 年斗争阶段的历史是从 1868 年 10 月 10 日开始的一样。独立战争，或以独立命名的战争开始于 1895 年 2 月 24 日。这是真正的历史，为什么要进行讨论呢？讨论得那么热心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会得到什么？

应该写一部古巴民族史，总有一天，也会写出一部政治思想史，现阶段史，那时；每个人所起的作用、每个人功绩的大小，就会昭然若揭，谁也不能抹煞任何人。当将来编写政治思想史的时候，谁能否认梅利亚的功绩呢？除去其他一切努力，除去劳动人民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热爱自己斗争的因素以外，谁能抹煞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缔造者们的功绩呢？抹煞他们在工人和人民之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帝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所起的卓绝的作用呢？一部客观的和真正的历史一定会产生的，也许我们会参加这一工作。因为总有一天，当我们摆脱了今天所面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将会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真诚地来讨论、分析、批判错误、成绩和所有的事情，来创造一部我国的客观历史。

为什么现在进行讨论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如果从来没有人想窃取别人的功绩，讨论为了什么？事实上可能正在扮演历史上傻瓜的角色，为什么硬要冒充历史的哲学家呢？无聊的争论！

我们这些革命领导人，有一天一定会坐下来诚恳地进行讨论，为我们这一代，为了后代和为拉丁美洲其它兄弟人民作出有

益的教訓，從我們的成績和錯誤中得出相應的結論。我們至今還沒有這樣的條件。我們只有機會向大家真誠坦率地講話，向來是“把凱撒的功勞記到凱撒名下，把上帝的功勞記到上帝名下”的。

當然，將來，所有這些問題都一定要談的。

我還要談幾個問題。這一種思想造成了不公正、過失和錯誤；例如，對很多起義軍中的老同志就有一些錯誤看法和不公正的做法。有一天，我們到一個地方去，並且遇見了一百多參加過多次戰鬥的軍官。“你們在幹什麼？沒率領軍隊嗎？”“沒有。”“對這些同志怎麼安排的？”“由於政治水平低沒有讓他們領導軍隊。”噢！政治水平低。那麼，什麼是政治水平低呢？正是這些同志進行了革命，成功地進行了戰爭，並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怎麼今天卻又跑出了一個政治水平高低的問題呢？對於那些為革命戰鬥過，對革命忠心耿耿，在動蕩的時刻毫不动摇，一往直前，反對動搖分子，抗擊敵人，並且隨時準備犧牲生命，在僱傭軍入侵時立即動員起來，並且在宣布這一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與僱傭軍進行誓死戰鬥的人，怎麼能夠在革命勝利之後，說他們因政治水平低而應革除軍隊的領導權，並且隨便換上一個只會背誦馬克思主義教條而不知運用的夸夸其談者呢？任何一個夸夸其談的人，既沒有作過戰，對鬥爭也絲毫不感興趣，難道這種人具有更高的政治水平，而應該領導軍隊？這難道是馬克思主義嗎？這是列寧主義嗎？

照這樣下去，不知有多少同志，甚至加米略·西恩富戈斯也難免被剝奪挺進縱隊和軍隊的領導權，而將領導職位交給任何一個能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像鸚鵡學舌一樣談得稍為流利一些的迂夫子。

当加米略被任命为挺进纵队司令的时候，我們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忠心耿耿的人，自觉地为正义事业进行斗争的人，具有革命者的全部心灵，有着共产党员的素质，（这正是加米略的素质）——应该看看他的著作和手稿，以及他在谈到费利克斯·托雷斯（Félix Torres）（他在拉斯维利亚斯见到过他）的信件中所流露的团结斗争的精神——对这样一位有胆识的、英勇的、在战斗中像猛虎、在一切考验面前机智灵巧并且把部队从困难环境中拯救出来的同志，我没有对他说：给我背诵《资本论》，相反，在我们任命他时，我们唯一关心的只是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具有什么品质，他能不能把部队带到比那尔德里奥省。如果他不是在拉斯维利亚斯省接到在当地驻扎待命的命令的话，他一定会把队伍带到目的地。

如果根据这些奇谈妙论，现在也许有人要对加米略进行一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考试，并且革了他的职，而把领导权交给任何一个受过一点点军事训练的饶舌者。西罗·弗里亚斯（Ciro Frias）、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巴斯（Paz）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出身于农民和贫苦家庭、在他们的意识中有着被剥削阶级的本能和反抗性、在为本阶级利益的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士和英雄们也必然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流血牺牲为了实现这样的革命，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然而到头来却因政治水平低而被剥夺掉军队的领导权，这难道不是十分荒谬的吗！

我认为，这是愚蠢，昏庸，是完全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政策。

同志们，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产物，是我们应该根除的。这是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是我们无法避

免不得不进行的糾正。

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在—个党内产生的呢？这就是目前討論得相当多的个人迷信問題的来源。也許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教訓，由政委向部队讲—讲，由校长在学校里談—談。据我們所了解，或至少我认为，所謂个人迷信与领导人的威信、权力毫无共同之处；看来某些人与我們的想法相反，他們是这样理解問題的。

有誰想到过过去发生的、然而并不难发觉的問題呢？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們是应当看到正在发生的这种現象的。大概也还有人认为这些問題同我們有关系；他們观察我們的态度，看我們是否也对个人迷信的問題有所爱好。

当然，在我們的思想中从来沒有出現过类似的想法和怀疑，因为我們知道，这类問題在我国并不存在，我們存在的是其他問題。現在，試問：如果我們連在自己鼻子底下发生的事情也看不到，我們如此大談這個問題，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問題并不在于这会使革命政府的总理有被卷入个人迷信泥沼中的危險。不管別人是否願意，老实說，我們是既不願意，也不感兴趣。对于我們本人，这些問題並沒有兴趣，我們感到兴趣的只是从它对革命有好处还是有害处，对人民、对这一代以及后代是否有益的观点来看問題。但是对那些头脑中也可能出現过我們也会产生这种傾向的嫌疑的人，最好提—下某些事实，例如我們进行了一場战争，領導了战争，贏得了战争的胜利，而我們任何人的肩上都沒有將軍的星章，我們的胸前也沒有挂上勳章。

我們作为政府的領導人，所頒布的第一項法令就是禁止設立塑像——当时並沒有像現在这样热烈地討論个人迷信的問題，但是我們由于发自内心的願望明令禁止为活着的人树立塑

像，禁止將街道、城市或工廠以活人的名字命名，甚至还以法令禁止把我們的画像挂在政府的辦公室內。這是出自內心的願望，深刻的革命信仰，而不是欺騙宣傳，才這樣做的。

巨大的責任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國人民群眾把巨大的權力交給我們，而我們懂得怎樣正確地、根據我們的職責和其他人一起適當地分擔這一權力。

我衷心地、堅定地相信集體領導的原則，但是這並不是任何人強加給我的，而是我固有的深刻的信念，我也就這樣身體力行了。我堅信我去年12月2日在這裡講過的話，我相信集體領導，相信群眾創造歷史，我相信，那些最好的意見，最有權威的和有經驗的人的意見只有在集體討論後才能夠擺脫弊病、錯誤、缺陷和不足之處；同時我還相信，無論人民的歷史還是國家的生活都不取決於個人，或杰出的人物。這一點是我堅信不疑的。

為什麼我要說明這一點呢？因為除其他錯誤外，我們也犯了這種錯誤。關於馬克思主義問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豐富而生動的歷史；關於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歪曲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鬥爭，等等，我們有許多東西要討論，我們要向列寧、向馬克思主義從誕生迄今的發展史學習的東西也多得很。

有一些問題，像這個個人迷信的問題，在學校中，在許多地方反復地進行着討論，我們認為，這個問題談得太多了，同志們，這不是因為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說來，人們可以一直討論到死，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它不會影響我們。

但是，我要問：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起勁地討論一個不屬於我們的、而是蘇聯的問題呢？的確，凡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經驗有關的問題，我們是應該了解情況，向別人說明情況，甚至加以討論的。但是，我們不應當把它變成我們討論的中心議題，因為我們

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問題要討論。打个简单的比喻，这无异于：我們大張旗鼓地开始抗鼠疫运动，而当前的流行病却不是鼠疫，而是瘧疾和脊髓灰白质炎。

当然，我們不希望发生鼠疫，我們應該打防疫針并采取措施；此外，我們还應該了解鼠疫是甚么一回事。但是我們要全力防治的却是当前流行的病害：瘧疾和脊髓灰白质炎。在我国并没有存在过这种病的威胁。而唯一的危險就在这里，可是我們却看不見了。我們是多么的糊塗！理論和实践是多么脫节！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訓！对一个问题进行了許許多多的討論，并且还是冒着使群众陷于混乱的危險的；然而，仅管我們对这个問題进行了那么多的討論，却没有看到就在我們身边的毛病。

許多人說：这里会不会像苏联一样发生个人迷信呢？革命政府的总理是不是一个需要大家警惕使其不陷入个人迷信的人呢？

我认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坏的动机；沒有，我确信沒有。傳来了这方面消息，討論得很好。但問題是，很多人在討論中迷了路，很多人对当前最迫切和最重大的問題有些迷失方向，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而走入了歧途。因而就上錯了一趟火車。

我知道：这許多混乱的討論，整个这个运动，整个这个当时正在国内形成的問題，部份地是和对一个不应当成为我們討論中心的问题不适当地进行了討論有关的。

这种下意识地、自发地产生的情况帮助造成了另一个問題，另一种現象，为破坏革命的威信打开了方便之門。为什么要破坏革命的威信？革命越有威信越好，革命的权威发言人越多越好。因为一个十人的合唱团与一个三百人的合唱团是不一样的。在你們見到一个合唱团时，如果这个团有十个人，就很好

了，那末它有三百个人的話就更好，更美妙，更精彩了。如果我們有了一个、两个、十个有威信的領袖，那么我們还應該有更多有威信的領袖。不應該損害有威信的領袖。

如果我們損害了他們，結果会怎样呢？当困难的时刻到来时，人民不幸地将沒有可以信賴的人。假如再发生吉隆滩事件或更坏的情况：一下子发生十起吉隆滩事件，那时就要对人民講話了，那就是需要人民的信任了。

散布一些怀疑能得到什么？破坏革命威信又能得到什么？

当然，对于一切忠誠的革命者和許多談过这个问题的同志，我没有想表示任何責怪。但是，同志們，我知道，当时正在形成一种情况，而不幸地，这种討論……就好像現在我們来討論一些将来應該討論的事情，这些事情将来是要討論的，但是現在不應該討論。因为，現在討論这些問題是有害的，不适时的。應該在将来再討論这些問題，而把花在这些討論上的時間用来研究別的問題。因为，不幸地这些討論正好与这里巧妙地进行的破坏某些杰出的、非常寶貴的同志的威信的運動相合拍。这些運動就是从今天晚上我們所指出的問題中产生的，就是从我們今天所提出的問題中产生的。是一連串很巧妙地进行的、用来反对革命的一些非常寶貴的同志的運動，同志們，这些運動是宗派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这对群众的影响如何？很清楚，这可使群众意志低落。这会不会使群众去反对革命呢？不，群众不会反对革命；尽管有这些錯誤，群众現在和将来都是和革命站在一起的。但是它却可以降低群众的积极性，降低群众的热情。

这对革命的政治組織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很简单，同志們：以前我們在建立的不是一个組織，我已經說了，以前在建立的是

一具鐐铐，一种束縛。我还要說：我們建立了一个像甲壳一样的組織。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群众并沒統一进来。这里說的是統一革命組織，但是以前統一革命組織是怎么样的呢？是根据是不是人民社会党的党员来組織的。

那末其他一些組織：革命指导委员会、7月26日运动是什么組織呢？它們是不是由有組織的、党龄很长的成員組成的呢？不。这是一些拥有群众巨大同情的組織，是沒有組織的群众洪流：这就是7月26日运动和其他一些組織的情形，它們拥有巨大的威信和广大的同情。它們不是有組織地組織起来的。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个組織，建立一个統一組織，而不把群众統一进来，我們就統一不起来，我們就会陷入宗派主义，正像我們以前所陷入的一样。

那末，支部又是如何建立的呢？現在我來說一說。在所有的省份，人民社会党的总書記担任了統一革命組織的总書記，在一切城市里，人民社会党的总書記担任了統一革命組織的总書記；在所有支部中，人民社会党的党员担任了支部的总書記。这是統一嗎？阿尼瓦耳同志應該对这种政策負責。

这引起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們大家都进行过各种斗争来反对反共主义，进行过思想意識形态的斗争，不断地进行过演說来粉碎反共主义；因为反共主义——我們曾經这样指出过——会在另一方面产生宗派主义。因为被孤立的、被打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們就会跑到他們自己的組織中去保护自己，在自己的組織中躲起来。

这些就是反共主义和打击的做法的后果，即产生宗派主义。根除了反共主义之后，那时候要是还存在那种“极端”宗派主义，它又会产生反共主义和混乱，因为大家会开始提出这样的問題：

“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专横、濫用职权、享受特权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现象，这就是共产主义嗎？如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話，他們一定会說印第安人阿图埃^⑫当年所說的那句話。当印第安人阿图埃正被人活活焚燒的时候，一位神父走到他面前，問他是否願意到天堂里去。他回答說：“不，要是这就是天堂的話，我不願意去。”明白嗎？我應該讲清楚这一点。

誰也不会有絲毫猜疑，我相信，如果有人現在还存有猜疑的話，他一定是完全“墮落”了，就讓我們用一下这个字眼吧。

在这种时刻，我應該非常客观地讲话，要十二万分的客观，然而却是坦率、忠实和誠实，不隱瞞任何事情。因为，同志們，我們應該負起責任来，使我們的話不被別人歪曲。

这种宗派主义会再次引起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政权的时候，去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取得政权，还完全处于被包圍、孤立的环境时的方法，这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自己和群众隔絕起来，这是发疯了，这是发疯了。当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占統治地位时，統治阶级，剝削者等等敌人要孤立我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工人，农民，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把自己和群众隔絕起来，脫离群众，那就是犯罪。宗派主义就会成为反革命的东西，因为它削弱并損害革命。

什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想呢？“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事业”。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們的人数很少，一万人，一万五千人，五千人，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吧。

当这一事业，他們的事业，他們的旗帜，他們的理想已經成为三百万古巴人^⑬的理想时，还脫离群众，而且还像只有五千人、一万人或一万五千人时那样进行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呢？同

志們，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當我們已擁有群眾力量時，發生這樣的錯誤是犯罪，是反革命的罪行。必須要把群眾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必須有新生力量和新的幹部在內，它不只是由當這個組織還是非常小，當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只有數千同情者時的那一點點幹部組成的；當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國擁有數百萬同情者時，必須建立和數百萬人相適應的組織。採取相反的做法，正如我們在某些會議上所指出的，就是想把亞馬遜河的水注到考托河去，想將桶內的水倒進杯中，而不是將考托河的水注入亞馬遜河，將杯中的水倒到桶里；這是想在兩層樓的房子上加蓋一幢四十層的大廈。同志們，這樣會倒下來，會脫離群眾的！

我們已經犯了這種錯誤。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看來，那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一個必須糾正的錯誤。

錯誤的結果是什麼呢？很簡單：開始組織革命支部，但是這些支部都是地下的，都是地下的。你們知道和地下群眾的直接聯繫是什麼樣的嗎？你們知道像在巴蒂斯塔時代那樣建立一個地下支部是怎樣一回事嗎？就是說，群眾是不認得它的。

那麼，我們是怎麼做的呢？瞧！在一個有五百個工作人員的地方，我們建立了一個有七個人的支部。請利亞努薩(Llanusa)同志原諒，我要舉體育宮的例子來說明。

加盧丘(Garrucho)和他帶來一起工作的兩個婦女……加盧丘是誰？我們不去討論加盧丘是誰。在加盧丘這個問題上是犯過錯誤的。加盧丘在1954年曾被選為統一革命黨的市政委員；據我們看那時雷格拉(Regla)地方的社會黨支部犯了一個錯誤——我們應該坦率地談，因為我們不是在進行指責，也不是在追究責任，絲毫也不是這樣；讓我們把這一切都拋在一邊，今天，

我們所有人談任何事情都應該毫無成見，毫不吞吞吐吐——他們犯錯誤是因為，這個人後悔了，因為這個人說，他準備辭職，後來，他們就讓他參加人民社會黨了。好了，後來就把他留在那裏了。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却是清楚的：這是那個支部的一個錯誤的策略——是支部的，不是黨的——但是，事實上這個人到12月31日那天還在做市政委員。

儘管他和其他的統一行動黨和革命統一黨的市政委員一樣受到大家的憎恨，等等，但他突然變成了一個英雄，從一個革命統一黨的市政委員變成了一位革命領袖。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好，這沒有關係，可以進行解釋，這是一個錯誤。無可爭辯，接受他為黨員是個錯誤……正好像……行了，還需要再舉什麼例子呢？我尚可舉一個，但是，現在我不願意再提起這些可憐的家伙，因為，我不願意任意地來傷害人。

後來，加盧丘到文娛體育委員會去工作了。他帶了一個女秘書和另外一個女青年去那裏工作——我認為，這是兩個很好的女青年，對她們沒什麼可指責的。加盧丘在那裏成了一個高級官員——他是從某省的文娛體育委員會派到利亞努薩那裏去的——，並掌握了大權。

讓我們來看看文娛體育委員會的支部是個怎麼樣的一個支部吧：四百個^④工作人員中，只有七個人是支部的成員！而那裏有幾十個很優秀的、非常好的同志。這七個人是：加盧丘，他帶來的兩個婦女，利亞努薩，他的女秘書和兩個老共產黨員：埃斯基耶耳·埃雷拉和潘喬·洛佩斯。就是這些人組成這個支部的；這就是我們和那裏群眾的地下直接聯繫，我們聯繫四百多工作人員的地下組織。你們認為這是一個政治組織嗎？

好了，利亞努薩，因為他是利亞努薩，是文娛體育委員會的

主任，我认为，利亚努薩同志有权成为这个支部的一員；他的女秘书，她所以成为支部的成員，我想是因为她是利亚努薩的秘书——虽然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很好的姑娘，而她們沒有当上利亚努薩的秘书。那里还有另外一些很好的姑娘，但是，因为她們不是加卢丘带来的，所以她們也沒有成为这个支部的成員，还有两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是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是个优秀的工作人員，那里的群众把他評为模范工作人員——看到这个支部的一个成員被群众評为模范工作人員是多么高兴和多么令人滿意呀！——好了，这就是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潘乔·洛佩斯也是被群众評为模范工作人員的，据我了解，他是在G—2处，或是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犯了一些錯誤之后到这地方来的。但是潘乔也在这里，——据说他是个好同志——而且他也参加了那里的支部。是“这个支部的七个特权人物”之一。

埃斯基耶耳·埃雷拉是誰呢？据说，加卢丘本人曾提出要以他的、加卢丘的表兄弟来代替他，一个老党员。这是利亚努薩同志对我說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件事。利亚努薩同志已經同意了。我們不談那个問題了……刚才談到的那一些情况都有很好的見证人，所以不会有捏造的問題。

我們再来看看阿姆巴馬达厂。阿姆巴馬达厂已是比文娱体育委员会更具有无产阶级气息的一个中心。当时快要举行一次代表大会。那里也已成立了一个支部，成員是九个人……

这个九个人的支部也是用这种方法組成的：厂长同志、厂长的女秘书、厂长的姻兄弟……当然我要說，厂长的姻兄弟是一个那里工人們公认的好同志，但事情还是一样。

当我们去那里稍为查对一下支部的意見时，人事科长来見

我們。在一个全是穿着沾滿油膩的絨絨衫和工装褲的工人的无产階級中心，一个人事科长却穿着花衬衫和白褲子，他还是革命支部的成員呢。同群众相距十万八千里，多見鬼！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是这样造成的：

他們选拔了老党员，派他們当领导委员会的委員——这是一些留下来的老党员，因为其他一些已調去担任別的工作了——派他們当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委員——人事科长，厂长；后来当建立支部时，他們又把这些老党员拉来。这样他們就把行政管理委员会变成了支部。支部的成員全是老党员，行政管理委員；支部沒有一个是群众，沒有一个是群众！这是一个行政管理支部。

这些例子說明了我們所犯的錯誤。

好，这些事情的情况怎么样呢？工业部每月奖励六十个到一百个工人；这次受到奖励的六十个人只有五人是革命支部的成員。革命支部的成員占的比例平均为百分之五到十，每一百个工人中有五个到十个，大概就是这样一個数字吧？平均每一百个受奖的工人中有五个到十个。这就是我們的情况。这些事情是我們必須……我們大家，新党员和老党员，抱着共同的目的，一起来糾正的。

我們說：“好了，必須糾正这种情况；这不是一个直接联系群众的組織”。那么，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动員力量呢？以前我們自己欺騙了自己。革命所以有这么大的动員力量不是因为有了这个甲壳似的組織，而是因为有着革命动員群众的工具：电台、电视台、报纸——各种各样的工具。那时我們曾和塞薩（Cesar）同志討論过。他认为，通过这些动員群众的手段有惊人的——直接的——动員力量。这种甲壳是不能动員群众的。

如果敌人进攻时我們只能依靠这个像一个甲壳似的党，我們就好看了！这是一个甲壳。那里面有着非常好的同志……以后我要談这个問題，以后我还要談到老共产党員的問題，談談所有这些問題。談談我們應該如何客观地、冷靜地、誠实地、公正地和正确地看待这些問題。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动員群众的組織。事实上，通过革命指导委员会^⑮，就有很大的动員力量，有很大力量——主要是通过革命所掌握的动員群众的各种手段。但是却沒有一个直接联系群众的組織，而这种直接联系就是先进的无产階級政党的作用。

那末，很簡單，我們必須把群众統一进来。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些統一革命組織，而群众，那些革命的群众，进行革命、創造历史的群众并沒有統一进来，因为組織里沒有任何群众，沒有任何群众！以前就是这样来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新老共产党人和公民都会同意，这終究是一个錯誤。今天，我們不是在共产主义、反共主义及思想意識形态的定义之間进行爭論；并非今天才完全肯定革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們正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們的錯誤进行这次自我批評。誰也別做梦，誰也別痴心妄想！別以为我們會倒退一步，不，相反我們要前进。

当你們阻止了我們前进的时候，我要說，我們要前进，要更多的前进；我們要大踏步向前迈进；我們正是通过糾正我們的錯誤来大踏步前进。

我們在这里进行討論；进行作为馬克思主义的同志，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自我批評。让敌人願意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我們懂得，这对敌人是不利的；这种討論对敌人是不利的，这样糾正錯誤对敌人是不利的；糾正这些錯誤，在現在和将来，都只

会对革命有利。

也就是說，我們曾經犯过这一切錯誤。我們必須是一个工人階級的先鋒政党，一个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先鋒組織。我們应当代表工人階級执掌政权，我們正是代表着工人階級和劳动者階級在进行革命，管理这个国家。

我們的政党必須是一个以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以路易十四的方法組織起来的政党——我再重复一遍我在以往几次會議上說过的这句话。路易十四的方法是：我就是党，“嘭！”“嘭！”接着，就由我来指定党的成員。不，这不是民主集中制，这与民主集中制沒有相同之处；民主集中制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政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經過挑选組織起来的领导机构。这个领导机构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是把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工人階級中的优秀分子集中在这个党内，應該把全国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集中在这个党内。哪些人呢？模范工人，模范工作者，这种人是很多的。

也就是說，要成为这一支部的成員，必須首先是一名模范工作者。倘若他不是一名模范工作者，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者、共产主义建設者。任何一个游手好閑不事劳动的人都无权呆在一个革命支部里面。

但是，这还不够，我們在这次大会上所得到的經驗，以許多有趣的例子向我們說明了这点。他必須是一名模范工作者，但也必須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必須接受革命的思想意識，当然，他应当希望自己属于这个革命支部，應該接受一个革命支部成員所必須担負的种种职责。

此外，还必須是一个历史清白的人，也就是說，过去并沒有为暴政統治充当过兵卒或警察；当然，有些軍人曾經长期坐牢，这

些人应当作別論。有些情況是特殊的，但是，加盧丘的情況當然不是特殊的。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前，加盧丘一直是市政委員。如果他不是在那里真干的話，我認為他倒是一位英雄，因為他竟把自己裝成巴蒂斯塔分子達如此之久，應該授予他一枚獎章。

我要說明的是：應該是一個歷史清白的人，在他的一生經歷中，沒有當過穆哈耳分子^⑩或巴蒂斯塔分子，沒有參加過統一行動黨或革命統一黨，沒有在專制暴政的軍隊或軍事情報局等組織里服務過。這種工人的一生應該是沒有恥辱、清白無瑕的一生。

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大會上——我大概是在阿斯普魯煉鐵廠舉行的一次大會上——所發生的事情是很有趣的。當時由群眾提出模範工人。像在我們參加過的兩次大會和其他會議上一樣，可以看出群眾總是有識別能力的，他們往往推薦某某老黨員，因為他表現出是一位偉大的共產黨人，一位優秀的工人。

群眾具有高度的識別力，他們常常指出某人過去的历史是不好的。每當問群眾是否知道某人的履历时，他們就會立即給予回答。不幸的是往往發生有些模範工作者历史不好的情況，但就會像這次大會一樣，發生這種事情：有人提出某某先生可以當模範工作者，這時，一個工人在眾人中站起來說，“他過去是個穆哈耳分子”。於是，這個人就自我辯白說他不是穆哈耳分子，他供認過去曾是巴蒂斯塔的同情者。而群眾還是認為應該吸收他到這個支部來。這些群眾的思想是混亂的，必須引導他們。就是說，要向他們解釋：這個人不能成為支部的成員，因為，凡是誰說過去同情巴蒂斯塔，就是說他過去贊同本圖拉（Ventura）和卡拉塔拉（Carratala）等一切罪犯所犯下的種種罪行，屠殺和酷刑。所以，應和這些群眾進行討論，對他們說：這樣不行；這

就是党組織者应起的指导作用。

当然，并不是由群众来选举支部。党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经过挑选，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来的。应该注意群众的意見；这个革命支部的一切成員都应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看到过一些确为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們曾出席过一次大会，請群众提出一份十五名他們认为是模范工作者的名单。他們就在那儿提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也有人使用了种种詭計、欺騙、开小会等手法；但一位能干的大会成員阻止了这一切活动。我們問到会群众：“你們是否认为还有某人工作很好，却很遺憾地沒有列入這張名单？”他們就指出了—一个青年工人。他是黑人——我想这个同志大概名叫胡安·安东尼奥·貝坦科尔特 (Juan Antonio Betancourt)——他在—块木板上站了起来，看来非常謙虛、穩重。

“同志們，为什么你們认为他是一位模范工人呢？”于是人們就解釋起来，一个工人很坦率地說：“我过去对革命是不滿的。我被調到这个地方工作，胡安·安东尼奥同志开始接近我和我进行了多次談話，再三向我解釋。他做了不少工作，表現很好，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們总是看見他埋头苦干，病了也不缺工，因而他說服了我。現在我已是一个了解革命，和革命站在一起，并願意保卫革命的工人。”

又一个同志站起来說：“我补充几句。我在这儿常常不上工，而到街上去当临时工，因为这样我可多賺錢，可多賺二、三个比索。胡安·安东尼奥就来找我，每天和我談話，告訴我这样做是損害革命的，我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有害于工厂、有害于工人階級、有害于祖國的。从此，我天天上工，不再缺工。”

另一个站起来說，“胡安·安东尼奥牙床有病，常常有麻煩，有时臉肿半个月，但从沒有缺过工。”

又有一个工人站起来說：“这个同志是油漆工，后来轉到办公室工作。有一天，我們送来了十五辆小車子，急需在这儿上漆。这个同志說：不用耽心，我給你們漆。他下班后就来了，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把所有的車子全部漆好。工作十五个小时还是二十个小时对他都是一样。”

群众贊揚着这个工人的优秀品质。了解到这些事情确实令人感动。当时我問一个工人：“你认为这个工人怎么样？他做得比你出色？”这个青年工人对我說，“比我好十倍！”

“你想像他一样嗎？你认为能够赶上他嗎？”他說，“也許能，也許不能。如果我刻苦努力，也許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出色的工人。”

这种人才是我們應該吸收进来的！如果他是一个历史清白的工人，过去不是巴蒂斯塔分子，不是穆哈耳分子，沒有不好的历史，我們就應該爭取他，在学校中教育他，教会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这种人是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者、共产主义建設者的最純洁最宝贵的原料。在群众中可以找到許多模范，他們願意从事一切必要的工作，进行种种努力，即使病了还坚持工作，从不易缺工；如果沒有这些模范，怎么能够建設起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种工人是民兵，他們天天参加收割甘蔗和放哨，他們能說服別人，群众都把他們称为劳动英雄，称为模范工人。我們應該吸收这种人，吸收一切优秀的新老革命者。

我們怎么能把群众扔在一边呢？我們怎么能脫离群众呢？在老的革命者中，很多是为群众公认的模范工人，也有另外一些

不再是模范工人，这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共产党员的称号并不是贵族的尊称，也不是世袭的封号；共产党员意味着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应从他做党员的第一天起到死为止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态度。如果放棄这种态度，虽然他曾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已不再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革命，对待他的阶级，对待人民。所以，我们也别把共产党员看作为世袭的称号！

我們陷入了这个问题，陷入了等级问题，不是阶级问题，同志们。我們不能放棄阶级原则而陷入等级问题，陷入贵族头衔，特权，宗派主义中，同志们。所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优秀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这点。

我們根据什么精神来进行这种批评呢？是否我們要改变人们对老共产党员同志的印象，制造不好的声誉呢？不是的，同志们，永远也不会的。相反地，我們认为，许许多多好共产党员同某些方法，同某些非共产主义的坏方法以及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派主义态度引起的錯誤和威信損失是没有关系的；人們往往也把这些錯誤和威信損失的责任算在那些最优秀的共产党员身上，那是因为这些方法敗坏声誉，并有扩大的趋势。而群众也往往把共产党员看成坏的典型，而不是好的典型，沒有看到那些好的，那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我們进行这个批评，就人們的批评进行自我批评，事件发展到这一步田地我們人人都有责任，我們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为了克服錯誤；使革命摆脱錯誤；为了讓我們組織一个真正的先进的党，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組織。

不要把这个組織的职能和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混同起来。原来我們已經确立了一条这样的原则：在各級工作中进行干預，

这种干預在清除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极有效率地进行工作。我们怎能取消这个机构呢？我们怎能制造这种混乱呢？我们必须消灭这种混乱。

对老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尊敬的态度，承认他们的功绩，承认他们的战斗精神。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老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谦虚。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的态度应该怎样呢？应该谦虚。一个马埃斯特拉山的战士，一个地下斗争的战士应该是谦虚的，应该采取革命的谦虚的态度。应该消除“我干过这，我干过那”的态度。

这点我在12月已经提过了，应该阻止那些随时随地炫耀自己历史的人。为什么呢？我刚才对一个同志老实不客气，我说他躲在床底下。为什么我对这个同志下这样的断语呢？因为我知道，用那样的方法活动的人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这是否说凡是沒有战斗过的人都是躲在床底下呢？不是的。不要弄混了。我说的是那种机会主义者。那种机会主义者过去就是躲在床底下，沒有别的办法来称呼他，因为一个用这种方式活动的人是隐蔽的，颓废的，充满野心的。

先不谈这个。这里我们再一次坚持不应该把任何人和他过去所作的和沒作的事分开，同志们。这可以用来说明某些事情，某些问题，但先生们，什么是革命呢？革命高于我们每个人过去所作的一切；高于这里所有的每一个组织——7月26日运动、人民社会党和革命指导委员会，比每一个组织都重要。革命本身比这些都重要的多。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颗大树，有它的根。这些根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汇合成树干；树干开始生长。根很重要，但生长的是一棵大树的树干，是一棵很高的树，它的根集中到树干上。

树干是我們联合以来共同工作的全部成績；生长中的树干是我們今后要栽培的，是我們要继续共同努力栽培的。

同志們，将有一天——你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主要的，好好地想想——我們过去所作的事情将不太重要，我們每一个組織所作的事情将沒有共同作出的重要。讓我們树立这种思想。十年之內，二十年之內，我們將有一段为此努力的共同的历史，人們再也不会談起，在人民社会党内，在7月26日运动內，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內及其它方面自己作了什么；它們将像汇合起来的根一样，距离很远了。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联合起来像一个树干一样所作的事情。

这点我們已經說过了；我們共同作了什么？我們共同作了許多事情。能够否认反帝斗争、吉隆滩的对敌战斗的重要性嗎？在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二天，我們所有的人，老共产党人和新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又不老又不年輕的公民、群众、无名英雄等都联合在吉隆滩这个熔炉里，共同反对敌人。你們看看死者的照片吧，一百多人倒下去了，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偉大的时刻把他們联合起来，牺牲把他們联合起来。

重要的不是我們每人各自所作的，同志們；重要的是我們去共同作的，是我們不久之前所共同作的；我們所共同作的，同志們，對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样地有利。誰会那样的痴呆不关心我們大家所作的事，不关心对自己利害相关的事呢？誰那么傻不懂这些事？

这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的现实；我們應該整頓这些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因为机会主义分子钻进来呢？不，你們看，同志們，对机会主义分子應該設上两道防綫，以便不让一个机会主义者钻进来；这里沒有空隙。是騙子手阴謀家从某个裂口钻

进来了嗎？这里沒有裂口，在这里應該加强所有人的团結，老的和新的人的团結。

我們必須在工作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采取一种讲究方法的政策，一种有原則的政策。讲究方法和有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对所有人都有保证的唯一政策；每个人都觉得可靠。那种宗派主义的政策用清扫来进行威胁；由于这种宗派主义，誰都感到自己不安全；許多同志随时随地看到一系列彻头彻尾的宗派主义行动；沒有人感到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有原則的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个有正确方法的政策。一个有原則的政策，一个有正确方法的政策是一切革命者的保证，令他們感到安全。不是說我們朋友或別人的朋友都进来，不是朋友政策，不是一个无条件順从者的政策，不是一个俯首貼耳者和順从者的政策。不是！！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工人階級的先鋒队是革命者自由的結合，在这里，所有的革命者都奉行一种有方法有原則的政策，这个政策一視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人，工作着的人，退休的人給予保证。这个政策向所有的人保证反对不公平的事，反对濫用权力，反对歧視，反对虐待，反对这一切，让大家老的和新的都同样地感到有保证。

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改正这些东西时，我們就“轰，轰”，开始撤換和开除呢？不，同志們，絕非如此！因为需要的話，老党员可以留下，如果革命认为要安置他們，那就按照全部革命政策安置他們！而不是有傾向性的政策，不是个人路綫。不，先生！不，先生！我們仅仅是要整頓我們應該整頓的一切，整頓完了，将更加团結，更加强大；看看誰称职誰不称职，最后决定的因素是质量，是工作的质量。

現在，對待一個老的或新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怎樣呢？要比對待他人更為嚴格。應該對誰要求得更多呢？對組織的成員；我們怎會對自己組織的成員比對非黨員要求得更低呢？不！不！馬克思主義者，組織的成員犯一個錯誤就有雙倍的罪過。對這錯誤應該毫不容情，應該追究他的責任；從而，讓人們看到，參加這個組織不意味着特權、享樂、高薪、游手好閑以及任何恩賜，絕不！

讓大家都知道參加這個組織可以意味着一種巨大光榮，但意味着犧牲，比別人作出更多的犧牲，更多的勞動，比別人要更加忘我，比別人有更少的特權。

就應該是這樣的組織，以便讓好人，最優秀的人來參加，把那些不合格的人攔在外面，不讓任何一個消極分子、任何機會主義者鑽進來。讓機會主義分子去他的吧！讓機會主義分子到有利可圖的地方去，到有特權的地方去，但是，要作出犧牲的地方，要勞動，要刻苦努力的地方，機會主義分子不要去，讓機會主義分子回到自己家去罷。

這并不意味着成群結伙地來入黨，不！這個組織應該是一個十分精悍的組織，只容納在各方面最優秀的人。這就是我們應該建立的組織。對老同志要尊敬優待并相信他們。不要忘記，一個宗派主義者也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同志，但中了宗派主義的毒，被拖進宗派主義的政策，由上面某個人造成的宗派主義政策。

我給你們舉個例子：在大學里，發生過把埃切維里亞^①遺囑去掉三行這種極嚴重的宗派主義行為，教條主義行為。我們痛心地上議。這個人是誰呢？他是一個好同志！對這件事情負責的同志無疑是一位好同志，即拉維洛（Ravelo）同志。但為什

么犯这种錯誤呢？这說明是受一种路綫的影响，一种个人的路綫，一种被推行的路綫和政策，一种已經相当普遍的錯誤的态度。这位同志是位好同志。他回去，召集全校开会，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自我批評，結果他在学校的威信比受批評的那天更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态度很认真，群众都承认。他是一位好同志。

就是說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不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是不自觉地作了有害于革命的事。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自觉的，是受外来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同志从一定的地位上鼓吹起来的政策的影响，这个同志要負責，要对这种政策負責，因为他过去容忍、默許并实行这种政策，以致引起相当普遍的宗派主义态度。

那么，我們的态度怎样呢？我們对老同志的态度是不要有保留，而要信任他們。我来举个例子：在我的卫队里有許多老党员，我不想从我的卫队里辞退一个老党员，因为我完全信任这些同志。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說明怎样是真正信任的态度，就是說，現在我們不要陷入相反的宗派主义里去！我們不能陷进去！如果我們要克服錯誤，就不能陷入另外的錯誤中去，我們應該十分警惕，十分注意，确信我們將全力反对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表現！我們將用全力，用一切办法来反对宗派主义！我們要通过电台、电视和报刊来进行斗争，我們要揭穿在我們看来犯了宗派主义的、非法的、歧視的、保留和不信任的行为的任何一个同志，不管是誰犯了什么錯都要揭发。这将是我們的态度。

我想这是我們唯一正直的态度，是我們應該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保证所有的同志，将能克服这些錯誤，这种态度将加强

革命，同志們，使革命經過批評以後更加偉大。

敵人說什麼都沒關係！明天他們要大張筵席也不要緊。他們知道，他們輸了；我們開始改正嚴重的錯誤，群眾理解這點，群眾諒解這點，群眾是公正的，從這時候起，敵人就失敗了。他們在一個組織面前，在人民面前，在革命政府面前無能為力，革命政府有誠意分析、承認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有勇氣改正錯誤，有勇氣適當地、冷靜地、公開地改正錯誤。

我們今天十分嚴厲，我們認為這是必要的，是有用的，是健康的。因為，我們認為，同志們，從現在起，同志們，今後再也不要分什麼新的老的、馬埃斯特拉山來的和平原來的、打過槍和沒有打過槍的、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和過去沒有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

從現在起，我們應該是一個整體。不要向後看，不要像聖經里說的那個女人一樣，她要看那個湖，那座已經沉沒了的城市，終於變成了一個石像。我們不能夠變成石像，不能往後看我們過去所作的東西，自我欣賞，陶醉於我們過去的工作中，我們應該向前看，同志們！

這是我們所有的人應該採取的態度，是所有正直的人，所有正直的老的和新的革命者，所應該採取的態度，沒有保留，沒有急躁，沒有任何不信任，所有的人都團結在我們的事業、我國革命及我國革命歷史任務的周圍；團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周圍，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科學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是真正的革命理論，是非常豐富的真正革命的科學，從這門科學里我們可以得到極豐富的知識，在這門科學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傑出的鬥爭工具，一個無比的事業，為這個最好的事業而鬥爭，為這個最好的事業犧牲，這個事業只能是具有最真摯的人

道精神、真正的主义、真正的慷慨、真正的高尚精神。

敌人企图把馬克思主义描写成坏东西，不正义的东西，不，他們永远也不能利用那些行为不好的人的錯誤，那些不正确的人的錯誤来迷惑群众。

今天我国人民不仅有幸有一个胜利了的革命，一个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政权，还有幸有一个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不可战胜的，比反动思想、剝削思想要高尚一千倍，无限地高尚，这种思想是經過一个世紀的斗争丰富起来的，是用工人的血，无产阶级的血，英雄的血丰富了的，这些鮮血是为保卫正义事业、保卫人們平等的事业、保卫人們友好事业而流洒的！这是我們的事业，是我們的旗帜！

因此我們應該感到驕傲，为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驕傲，为我們的正直驕傲，为我們的爱国主义及这样坦率地公开地討論我們的缺点而驕傲，我們集体地討論过这些錯誤，向群众解釋我們所采取的措施——概括地、有重点地向他們解釋——把我們认为要对这些事实負責的同志开除出領導委员会和書記处，我們已經采取措施扩大全国領導委员会，以便把所有会在历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人都包括进去；让所有有各式各样功勋的人都参加这个全国領導委员会！

在各級也都要这样作，这将加强我們，将使我們的革命更加强大，让我国人民更加坚定地相信革命領導机构，让全世界各国革命者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让拉丁美洲各革命組織对我国革命有更大的信心！因为善于改正錯誤将提高古巴革命的威信；只要善于清除坏人，善于医治自己的病害和錯誤，善于克服这些困难，各組織将把全部力量貢獻給古巴革命！

同志們，請你們相信我們的革命就是这样地不可战胜！請

你們相信世界上永遠也不會有力量來戰勝我們的革命，這裡我再重復一下在我們進入共和國首都時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克服了自己的障礙，除了我們自己以外我們沒有別的敵人，只有我們自己的錯誤才能破壞這個革命！今天我再重復，但我說不，沒有我們不能改正的錯誤，因而沒有能夠毀滅革命的錯誤！沒有不能克服的錯誤，而我們的革命將是不可戰勝的。

譯者附注

- ① 1900年3月4日，給古巴革命政府運載武器的輪船《勒庫布爾》號（La Coubre）在哈瓦那港突然發生爆炸，傷亡達數百人。古巴總理卡斯特羅指出，應該從美國政府的官員中尋找進行破壞的禍首，美國政府曾經施加壓力阻止古巴購買保衛主權所需要的武器。美國武官和領事在這次爆炸事件以前，曾向比利時政府施加壓力，不讓它向古巴出售武器；當這個圖謀失敗之後，美國就進行了這次罪惡的破壞。3月5日，哈瓦那有五十萬人參加了爆炸事件的死難者的葬禮和抗議美國罪行的示威遊行。
- ② 加米略·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古巴起義軍少校，卡斯特羅最親密的戰友之一。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後，任起義軍總參謀長；同年10月28日乘飛機失事失蹤。
- ③ 何塞·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1853—1895），古巴民族英雄和詩人，1895年2月古巴爆發獨立戰爭的組織者，同年5月在同西班牙殖民軍作戰時犧牲。
- ④ 安東尼奧·馬塞奧（Antonio Maceo, 1848—1896），古巴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
- ⑤ 馬克西莫·戈麥斯（Máximo Gómez, 1836—1905），曾參加1868年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起義，後與何塞·馬蒂以及安東尼奧·馬塞奧等一起領導了1895年的獨立戰爭。
- ⑥ 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 1819—1873），古巴愛國者。領導1868年反西班牙起義運動勝利後，占領聖地亞哥，並宣布成立共和國，任共和國總統。1873年辭去總統職務，被西班牙殖民者殺害。
- ⑦ 伊格納西奧·阿格拉蒙特（Ignacio Agramonte, 1841—1873），古巴獨立運動領袖，是廢除奴隸制法令的簽署者和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草擬者。

1873年在反西班牙殖民斗争中牺牲。

- ⑧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批爱国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10月16日受到秘密审讯，他在法庭上坚持以一个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律师的身份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卡斯特罗在讲话中宣读了革命政府的政策和革命的法律内容，他后来称这是古巴革命第一阶段的纲领。
 - ⑨ 蒙卡达 (Moncada)，在圣地亚哥东北，系巴蒂斯塔的兵营，参见注⑧。
 - ⑩ 《格拉马》号 (Granma)，系195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墨西哥率领八十一名游击队员在古巴奥连特省登陆所乘的船只。
 - ⑪ 阿图埃 (Hatuey)，古巴的印第安族酋长，领导印第安人抵御入侵的西班牙征服者。当他被西班牙人擒住处死之前，西班牙神甫对他說，如果阿图埃相信他所說的話，死后可升天堂，否則將下地獄。阿图埃問神甫天主教徒是否也升天堂，神甫答是的。阿图埃立即回答說，不，要是这就是天堂的話，我不願意去。
 - ⑫ 指統一革命組織全國領導委員會所屬的一個機構，不是指3月13日革命指導委員會。
 - ⑬ 欧塞维奥·穆哈耳 (Eusebio Mujal)，是巴蒂斯塔独裁者的御用工会古巴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
 - ⑭ 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 (José Antonio Echeverría)，前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1957年3月13日曾领导一批青年学生攻打总统府，事后随即被独裁政府杀害。
- * 附注⑨、⑬、⑭取消。